

贵州珍稀人物传记《历代黔贤传略》稿本述论

王 燕

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6年3月9日；录用日期：2026年4月2日；发布日期：2026年4月10日

摘 要

《历代黔贤传略》一书于1936年由贵州文献征辑馆奉令编纂，后因经费不足长期以稿本存世，一直未得到重视。这部稀见的地方人物传记，旨在表彰先哲芳烈、宣扬乡邦精神；其内容以时有序收录汉至民初四十二位黔贤的生平事迹，文本中的注释部分蕴藏丰富历史信息；在史料运用上，远代人物以正史方志为据，近世人物则采用墓志、行状等私撰文献，与同期《贵州通志·人物志》可形成互补；其文本追求简明扼要、重文采辞章，兼具教材属性与文学价值。作为贵州乡贤传记的珍稀文献，《历代黔贤传略》不仅为贵州历史人物研究提供重要资料，其编纂方式与时代精神，也为深化贵州地方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

《历代黔贤传略》，稿本，贵州乡贤，编纂，文献价值

A Discourse on the Manuscript of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Virtuous Persons in Guizhou through the Ages: A Biography of Rare and Precious Figures in Guizhou*

Yan Wa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March 9, 2026; accepted: April 2, 2026; published: April 10, 2026

Abstract

The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Virtuous Persons in Guizhou Through the Ages* was compiled in 1936 by

the Guizhou Literature and Documentation Collection Institute under official orders. Later, due to insufficient funds, it existed only as a manuscript for a long time and failed to receive due attention. This rare collection of local biographies was intended to commend the virtues and achievements of past sages and promote the spirit of the native land. Arranged chronologically, it records the life stories of forty-two Guizhou worthies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The annotations in the text contain abundant historical information. The annotations contain a wealth of historical information. In the us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it draws on official histories and local gazetteers for figures of remote eras, while adopting privately compiled documents such as epitaphs and funeral orations for those of recent times-complementing *Guizhou Tongzhi·Biography Volume* of the same period. Its text pursues conciseness and emphasizes literary grace and diction, boasting both textbook attributes and literary value. As a rare document on the biographies of virtuous locals in Guizhou,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Virtuous Persons in Guizhou Through the Ages* not only provides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Guizhou's historical figures, but also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for deepening the study of Guizhou's local history through its compilation method and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Keywords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Virtuous Persons in Guizhou through the Ages, Manuscript, Virtuous Persons in Guizhou, Compile, Literature Valu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历代黔贤传略》是一部记载贵州历代贤能之士的人物传记，又名《黔贤传略初稿》，由杨恩元、柴晓莲、邹国彬于 1936 编纂。因当时经费拮据未能及时刊印，此后仅以稿本流传并渐散佚，长期未受学界关注。近年随地方文化研究深入推进，该书得以复原并入选《贵州文库》，但其出版形式仍以资料复印件影印为主，影响深入利用。目前学界对其内容价值尚缺乏系统研究。基于此，可通过系统梳理相关史料，深入分析《历代黔贤传略》的编纂特色及文献价值，为贵州历史人物及传记研究提供参考，丰富相关研究体系。

2. 《历代黔贤传略》的编纂特色

《历代黔贤传略》从内容上看，几位编撰者如杨恩元、柴晓莲、邹国彬等的筹划工作十分细致，颇耗心神，并将个人研究与时代要求投射到贵州人物的梳理与评价之上，编撰出来这样一部别具特色，富含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的著作，这在贵州人物传记撰写中是绝无仅有的。该书呈现出丰富的编纂特色，值得重点关注。

2.1. 以时为序的编排及人物分类的多样性

《历代黔贤传略》是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地方人物传记，其记载顺序基本上是以时间为序，且大体分为汉、晋、宋、元、明、清到 20 世纪初期之间六个部分。这种以时为序的编辑逻辑早在《春秋》中就有所体现，直到《史记》中将其运用成熟。《历代黔贤传略》沿用这种以时为序的方式，能够帮助较好地厘清历史脉络。《历代黔贤传略》收录了贵州汉至清末四十二位黔贤，收录人物时代跨度广，包括有汉代尹珍(附舍人、盛览、传宝、尹贡)，晋代谢恕，唐代赵国珍、宋代田祐恭、冉璉(附冉璞)，元代杨汉英，

明代王训(附詹英)、申祐、田秋、李渭、孙应鳌、石邦宪(附徐成名)、谢三秀、杨文骢、何腾蛟、吴中蕃,清代周起渭、陈法、李世杰、刘清、杨芳、朱射斗、唐树义(附唐炯)、赵德光、郑珍、莫友芝(附其父莫与俦)、丁宝楨、石赞清、黎庶昌、李端棻,20世纪初的张先培、黄芝萌、王宪章。

在选定人物之初,原是按照人物的突出成就为标准,据杨恩元《明代黔贤述略·序》中载:

兹将1936年奉行营电令所编《黔贤传略》拙著部分,辑为此篇,原稿十人附二人。理学则孙应鳌、李渭也,政绩则詹英、田秋也,忠盖则申祐、何腾蛟也,文词则谢三秀、杨文骢也,武功则石邦宪、徐成名也,高节则王训、吴中蕃也。[1]

但成书后,该书以时序对人物进行编排,并未按先贤的突出成就类型对先贤进行分类。因此笔者查阅相关史料记载,可对这四十二位先贤按照学问、政绩、忠义、文章、武功、高节这六类进行分类,如表1:

Table 1. Classification table of personal achievements of figures in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virtuous persons in Guizhou through the ages*

表 1. 《历代黔贤传略》人物成就类型分类表

学问	尹珍、舍人、盛览、傅宝、尹贡、孙应鳌、李渭、郑珍、莫友芝、莫与俦、黎庶昌
政绩	赵国珍、田祐恭、杨汉英、田秋、李世杰、丁宝楨、李端棻、唐树义、唐炯、刘清、赵德光、詹英、陈法
忠义	谢恕、申祐、何腾蛟、石赞清、张先培、黄芝萌、王宪章
文章	杨文骢、谢三秀、周起渭
武功	石邦宪、徐成名、杨芳、朱射斗、冉璉、冉璞
高节	吴中蕃、王训

2.2. 史料引用上注重文献出处的标注

《历代黔贤传略》在史料的引用上做到了凡下笔皆有所出。《历代黔贤传略》在史料的引用上彰显出严谨的态度,其每条目录之下均详列文献出处,以确保内容的真实可靠,绝不私以杜撰。该书对传主生平之勾稽,不论繁简与详略,皆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标注出其文献之出处。如目录中“谢恕”条后注:“据《华阳国志》《晋书》《贵州通志》《通鉴》”,“赵国珍”条后注:“据《旧唐书》《唐书》《贵州通志》《通鉴》”,虽晋唐人物已历时较远,但所据资料皆为正史史料。又如清人“李世杰”条后注:“据管世铭撰墓志铭、洪亮吉书《遗事》《啸亭杂录》、余金撰《记》《郎潜纪闻》《国朝先正事略》”,皆为研究传主生平之第一手文献,不作稗官野史言、道听途说。再如张先培、黄芝萌、王宪章三人,皆采“平刚撰《贵州革命先烈事略》”([2], p. 1),此书所记,或为其亲所熟悉,或为其采于耳闻,本就为研究贵州历史之重要材料,而《历代黔贤传略》以之为准,不采他录,不改一字,可见其在史料引用上的严谨态度。

《历代黔贤传略》虽已在目录条后注明参考资料来源,但实际上所参考的资料远不止于目录中注明资料。该书在每篇传文后还将文中所涉及的相关人名、地名、书名、制度、历史事件等进行一一注释并标注其出处,可见作者在编纂传主生平事迹时,不仅参考了大量与传主生平相关的一手文献,同时还做了不少关于撰写传主平时所涉及的相关知识的注释与考证工作,力求传文内容的真实客观性,以及便于读者进行相关知识的查找。如周起渭传,该书在目录条后注“据《耆献类征》《贵州通志》《贵阳府志》《陈田撰年谱》《黔诗纪略后编》《清一统志》”,而在该传后,就有对田雯、卫既齐、查慎行等人名与白纳长官司、新贵县、竟陵县等地名进行注释,对比目录条后注的所据资料,注释中所注的资料除

目录条后注之外，还有《山东通志》《先正事略》《浙江通志》《明史》等资料，可见作者在编纂时，对于传主生平的叙述，不仅参考了目录所注的资料，实际上还参考了其他大量的资料，作者收集文献的用心程度以及认真严谨的态度，使得本书的学术价值得到保证。

2.3. 注释内容的丰富性

《历代黔贤传略》采用“传记 + 注释”的编写形式，在传记文本之后附载大量注释，注释部分蕴含着丰富的延伸信息，具体可分为三类：

第一，注释涵盖了与传主关系密切的亲属及深交好友等重要人物的生平与著作，而这些内容在该书的凡例中并未提及。如《莫友芝传》：

传文：

江南底定，寓家金陵，放游于江淮吴越间，穷东南山水之胜，且尽交其魁儒豪彦，与张文虎、(二十八)汪士铎、(二十九)刘毓崧、(三十)张裕钊、(三十一)刘履芬(三十二)，谊尤笃。

注释：

(二十八)张文虎，字孟彪，一字啸山，自号天目山樵，江苏南汇人，清同治中，以诸生入曾国藩幕，保训导，光绪时卒。文虎博览群籍，尤长校勘，所校《守山阁丛书》《小万卷丛书》等，最精善。著有《诗文胜稿》《舒艺室随笔》等。

(二十九)汪士铎，字振庵，别号梅村，江苏江宁人。清道光举人，入胡林翼幕，卒年八十。士铎初治三礼，后研舆地，著有《水经注释文》《汉志志疑》《南北史补志》等。

(三十)刘毓崧，字伯山，一字松崖，江苏仪征人。清道光优贡，父文淇，精左氏，毓崧继父业，兼及经史百家。著有《春秋左氏传大义》《经传史乘诸子通义》《通义堂诗文集》等。

(三十一)见本书《黎庶昌传略》注。

(三十二)刘履芬，字彦清，号泖生，浙江江山人。清同治时官嘉定知县，工诗文词，著有《古红梅阁遗集》《沅梦词》。([3], pp. 69-70)

《莫友芝传》的传文中记载莫友芝与张文虎、汪士铎、刘毓崧、张裕钊、刘履芬友谊深厚，接着注释中就对这几人进行简要介绍并标注史料出处，这种编纂方式有利于对莫友芝的交友情况更进一步的了解。同时可见此传记实际上在主要呈现所选定的四十二位先贤生平事迹之外，其注释中还简略记载了与之相关的众多其他贤能之士的生平，客观上扩大了其人物信息的覆盖范围。

第二，注释中还涵盖时代背景、政治变迁、行政区域演变等内容。如《陈法传》中第一条注释载：“安顺为普里部蛮所居。元置普定府，明洪武十六年改安顺州，后省普安州入之。”([3], p. 10)在这条注释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元明时期安顺从元代普定府，到明代洪武十六年改设安顺州，再将普安州并入的这一行政区划演变脉络。

第三，注释中还引入了他人对人物的行为、功绩、著作等方面的评价。如《郑珍传》中第三十、三十三、三十七条注释：

《越缙堂日记》：“子尹之《说文逸字》，已为近日卓绝之学。今阅其《经说》仅一卷，而贯串精密，尤多杰见。其长在善读《经》文注文，不为唐以后正义所惑，有功于《经》学甚巨。”

近人卢冀野谓：“从来的诗人，歌咏家庭琐事的不多，子尹在这一点上是很伟大的。假使伦常一日不灭，读他的诗，最足以敦人的性情。”见《青年界》第八卷第一期。

《胡适文存·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当时贵州有一个大诗人郑珍，在贵州受了局部的影响，已替他晚年的诗增加无数悲哀的诗料。但郑珍死在五十八年前，已不在我这一篇小史的范围之内了。说也奇怪，东南各省受害最深，

竟不曾有伟大深厚的文学产生出来。” ([3], p. 58)

注释中引入了被誉为“晚清四大日记”之一的《越缦堂日记》中对郑珍《说文逸字》成就的评价、卢冀野对其诗歌风格的评价以及《胡适文存·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对其文学成就的评价，从这些评价中足见郑珍在经学、文学、诗歌等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由此可见，《历代黔贤传略》正文后的注释绝非简单附属，其蕴含的丰富信息，可为深入且全面地研究人物生平、所处时代背景、重要历史事件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

3. 《历代黔贤传略》的三重价值

《历代黔贤传略》不仅是对贵州历史人物的一次系统梳理，展现了贵州地区历代贤能之士的风采，更是研究贵州历史、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重要典籍，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

3.1. 文化价值：勾黔地文脉，凝地域精神

《历代黔贤传略》作为贵州地方文献中极具特色的文献稿本，其并非单纯的历史人物事迹辑录，而是对贵州本土历史文化的系统梳理与主动传承。其核心文化价值以人物传记为载体，勾连起黔地自汉至民初的千年文脉，提炼并凝聚独属于贵州的地域精神，彰显出西南边陲的地域文化发展脉络。

该书跳出了传统地方人物传记“存史备查”的单一编纂旨趣，以表彰先哲芳烈、弘扬乡邦精神为核心诉求，使地方人物传记呈现出全新的文化传播意义。与同期《贵州通志·人物志》《清代贵州名贤像传》形成鲜明差异，前者重系统存史，后者重图文浅述，均未深入挖掘人物背后的地域文化内涵，而此书将编纂重心置于精神传扬与地域认同，择取黔地先贤生平中最能彰显本土品格、代表地方风貌的事迹刻画，展现不同历史时期贵州本土人士的精神风貌，让地方人物传记成为连接本土人士与地域文化的精神纽带。同时，该书以时有序收录汉至民初四十二位黔地先贤，涵盖学问、政绩等六大领域，勾勒出了贵州本土文化从汉代文教初兴，到唐宋治世之才涌现，再到明代学术文学发展、清代考据与实务并行，直至20世纪初求新变革的发展轨迹，建构起清晰的贵州地域文化脉络。此外，该书兼具地方文献与乡土教材双重属性，依“中学教科书体裁”编纂，内容简洁、文辞通俗，将先贤的开拓精神、文人风骨、治学态度等转化为鲜活的典范，成为本土青年学子了解乡邦历史的重要素材，实现地域文化的传承。

此书的编纂与流传，更彰显了贵州本土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是西南地方文献编纂的重要范例。杨恩元、柴晓莲、邹国彬等本土学者以严谨态度梳理先贤事迹，结合本土文化特色对史料择取、整合与再创作，在保持文献真实性的同时兼顾地域文化表达性，主动承担起地方文化整理与传承的责任。这种编纂思路不仅是地方文化自觉的鲜明体现，更为后世西南地区的方人物传记编纂、地域文化整理提供了有益借鉴，推动了西南边陲地方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作为贵州珍稀的地方人物传记稿本，其文化价值超越单纯的史料记录，既实现了地方文化的系统梳理与传承，也为近代贵州地方文化传播发展提供重要载体，对当代贵州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有着深远借鉴意义。

3.2. 史料价值：考黔贤行实，补地方史阙

《历代黔贤传略》保存了大量珍贵的贵州历史人物史料，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该书在编纂时期，贵州同时也在继续修纂《贵州通志·人物志》。作为同一时期所出的贵州历史人物传记，《历代黔贤传略》在编纂人物生平事迹时，主要是将所据文献统一列于目录条目之中，《贵州通志·人物志》则是于正文中的段后注明所据文献。对于距离年代较远，可查阅的资料较少的人物来说，二书所据资料大致相同，皆据正史记载；而对于距离时代较近，可考资料较多的人物来说，二书所据材料表现出明显差异。试列举二书共有的不同年代的人物进行比较，如表2所示：

Table 2. Comparison table of historical sources between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virtuous persons in Guizhou through the ages* and *Guizhou Tongzhi-Biography* volume

表 2. 《历代黔贤传略》与《贵州通志·人物志》史料来源对比表

朝代	姓名	《历代黔贤传略》	《贵州通志·人物志》
汉	尹珍	《华阳国志》《后汉书》	《华阳国志》《后汉书》
	舍人	《西京杂记》《续宏简录》	《西京杂记》《续宏简录》
	盛览	《贵州通志》《遵义府志》	《隋书·经籍志》《遵义府志》
	傅宝	《经典释文》	《经典释文》《南中志》
	尹贡	《莫庭芝撰祠记》	
唐	赵国珍	《旧唐书》《唐书》	《唐书》《新唐书·南蛮传》
		《贵州通志》《通鉴》	《贵州图经·新志》 《嘉靖通志》《舆地纪胜》 《黔州碑记》
宋	冉璉	《宋史》	《宋史》
	冉璞	《贵州通志》《遵义府志》	《图经》
元	杨汉英	《元史》《新元史》	《元史》《新元史》
	何腾蛟	《明史》《何忠烈公年记》《贵州通志》 《黎平府志》	《开泰县志》《湘潭县志》 《黎平府志》
清	唐树义	《甘肃新通志》	
		《续遵义府志》	
		莫友芝撰《神道碑铭》	《甘肃新通志》
		唐炯撰《行略》	《续遵义府志》
		王柏心撰《行状》 唐炯撰碑《阴记》 黄彭年撰《墓志铭》	《清史》

对比二书史料引用方面,呈现显著差异,《历代黔贤传略》形成了“远代重官方正史方志,近世重私撰墓志行状等一手文献”的鲜明特色。对于远代人物,因原始资料散佚,二书均以正史、地方志为主要依据,但该书更侧重贵州本土编修的资料,体现了对史料来源的严谨性;对于近世人物,该书着重运用墓志、行状、年谱、神道碑等私撰文献,这类文献由传主亲友、门生撰写,虽可能受个人情感影响,但能补充官方记载在人物生活细节、家族背景、人际关系等微观层面的空白,为研究提供鲜活细腻的素材。而《贵州通志·人物志》对近世人物仍以正史、地方志等官方记载为主,权威性高但微观细节不足[4]。

两书史料运用各有侧重却互为补充,将官方史料的时代背景、宏观定位与私撰文献的微观细节、个人特质相结合,可助力对贵州历史人物的全方位、多层次了解,深入探究其在贵州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同时,该书对私撰文献的重视与运用,体现了近代地方学者在人物传记编纂方法上的独特取向,丰富和完善了地方历史人物研究的史料体系。

3.3. 文学价值：炼史笔载志，显传记魅力

《历代黔贤传略》继承并突破了传统传记文学“以实载事、以事塑人”的传统,既恪守“实录”原则,又通过细节上的描述,从多方面塑造出立体性的人物形象,让人物脱离“史料符号”,成为鲜活的文学形象。例如《吴中蕃传》中,对吴中蕃拒绝吴三桂的任职邀请的细节刻画,赋予人物鲜活生命力:

“先足桂王播迁时,中蕃扈从,与桐城方以智学士交,称莫逆。以智赠以所藏石砚,颇宝重之,未常离身。既辞三桂之命,三桂复使人加以威胁;乃佯狂掷砚市中,断为三截,使者信之,归报获免。及三桂平,拾砚重行补缀,于是编掷砚后所作诗文为《断砚草》,以前诗文曰《敝帚集》。”([3], p. 40)

“掷砚”与“补砚”的细节，既充满戏剧冲突，又将砚台作为故交信物与文人志节的象征，浓缩了吴中蕃“忍辱存节”的复杂心境，其感染力远胜于直白的品格评价。

《历代黔贤传略》在文本上多“以评传人”，兼具文学评论功能。如《吴中蕃传》中对传主诗歌的评论：

“直抒胸臆，乱头粗服，不屑屑雕章琢句以为工，而质厚气苍，自然瑰异。昔人谓其忧世嫉俗，支离飘泊，有心事不易告人，似屈原之行吟泽畔，杜甫之放歌夔州，良为确论。” ([3], p. 41)

这段评论不仅精准提炼出吴中蕃的诗歌风格，更以“屈原行吟”“杜甫放歌”作比，为其诗歌奠定了“忧国忧民、沉郁顿挫”的基调。既关联了中国文人“以诗言志”的传统，又让吴中蕃的文学成就与人格精神形成深度互证，使传记超越史实记录，具备了专业文学评论的鉴赏价值。除作者的独到自评外，书中还大量引入他人对传主的文学评价，进一步强化了文本的文学评论价值。以《郑珍传》为例：

友芝序其诗有曰：“论子著述，经训第一，文笔第二，歌诗第三，而惟诗易见才，将恐他日流传，转压两端耳。”经德吕茗香游黔，见珍诗，赠以长句，有云：“自是郑子诗，岂屑寄人篱。”足为千古定论。珍手订《巢经巢集》，独附此篇，殆首肯其言者。吴敏树称珍诗笔横绝一代，为有清所无，曾国藩亦以为然。近世学人如梁启超、陈衍、胡适、陈柱等，莫不推崇其诗，诚所谓“光焰万丈”者也。 ([3], pp. 52-53)

传中收录莫友芝、吕茗香、吴敏树、曾国藩以及近世学人梁启超等人对郑珍诗歌的评价，这些来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学者的评论，既从多方面印证了郑珍诗歌的卓越成就与崇高地位，又使传记的文学评论更显丰富客观。《历代黔贤传略》通过“作者自评 + 引入他评”的模式，使史实记录与文学鉴赏深度融合，具有较高的文学评论价值。

《历代黔贤传略》在文学语言的表达上，语言简洁流畅，重视辞章之美，行文水准突出。将其与《清代贵州名贤像传》对比，更能体现其文学趣味。以对陈法理学成就的记载为例，《清代贵州名贤像传》载：“生平潜心性理，尤服膺朱子之学，其伯父尝弃诸生入深山中求道，静坐月余，云：‘忽见此心光明洞澈，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法疑之，后以忧归里，于山寺中遍观《楞严》《圆觉》《法华》诸经，乃知象山、阳明之说实类禅宗。因著《明辨录》，以辟其非。” ([2], p. 27) 此段行文繁复，缺乏起承转合。而《历代黔贤传略》则记为：“黔之谈理学者，明以孙山甫、李同野为最著，清则法称首。孙李之学，于朱陆时有出入，而法蕲向紫阳，粹然不杂。其伯父拙夫尝弃诸生业入深山，静坐月余，忽谓：‘见此心光明洞澈，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法疑之。后归里，于山寺遍观《楞严》《圆觉》《法华》诸经，因发见象山、阳明之学，实类禅宗，乃著《明辨录》以详论之。” ([3], p. 10) 书中以“黔之谈理学者，清则法称首”“蕲向紫阳，粹然不杂”寥寥数语，便精准点明陈法的学术地位与思想特质，叙述其著书立说的缘由与经历时亦点到即止，避免繁复考证与空泛论述，在精准运用史料的同时，尽显文辞风采与深厚学术底蕴。

4. 结语

《历代黔贤传略》作为贵州珍稀的人物传记稿本，兼具独特的编纂特色与多元文献价值。其以时为序的编排、严谨的史料引用与丰富的注释内容，尽显编纂者的用心程度。该书勾连黔地千年文脉，补地方史研究之阙，又以鲜活的人物刻画与精炼的文辞彰显文学魅力，是贵州地方文献的重要成果。其编纂既体现本土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也为西南地域文化传承提供了典范。对其深入研究，不仅能丰富贵州历史人物与传记研究体系，更能为地方文献、乡贤文化研究提供新视角，助力贵州历史文化研究的持续深化。

参考文献

- [1] 杨恩元. 明代黔贤述略[J]. 贵州文献汇刊, 1940(4): 14-23.

- [2] 凌惕安. 清代贵州名贤像传[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46.
- [3] 杨恩元, 等. 历代黔贤传略[M]. 贵州: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9.
- [4] 冯楠, 主编. 贵州通志·人物志[M]. 贵州: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